

日本与东北亚战区导弹防御*

▷ 吴心伯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433)

美日合作研究、开发和部署东北亚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是冷战后美日安全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日本安全政策调整的一个重大步骤。日本决定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是地区安全形势发展、美日同盟强化和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对东亚地区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建立东北亚战区导弹防御构想后,日本的对策经历了对之进行基础研究、与美国联手开展技术研究和正式决定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演变过程。

在东北亚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5月,克林顿政府在全面审查了里根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发起的“空间战略防御计划”后,决定结束“星球大战”计划,转而发展“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该计划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二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前者的任务是拦截袭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后者则是为了保护驻海外美军和盟国免受来袭导弹的袭击。为确保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存在,加强日美防卫合作,同时充分利用日

本在资金和防卫技术方面的优势,美国希望日本参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和开发。恰在1993年5月,朝鲜成功地向日本海试射了1枚射程为1000公里的“劳动1号”导弹,并在研究射程更远的“劳动2号”导弹。华盛顿遂抓住这一机会向日本兜售东北亚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当时的日本外相羽田孜和防卫厅长官中西启介对美国的构想作出了积极响应。

日本政府在导防问题上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调整美日同盟的倡议的影响。1995年2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了《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推出新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强调美日安全同盟和共同发展战区导防系统的重要性。1995年4月,日本防卫厅成立了“弹道导弹防御研究室”,与美方合作评估朝鲜“劳动1号”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和进行相关研究。基于此项研究,日本防卫厅在1997年得出结论,日美合作开发战区导弹防御最合适的项目是“海军战区范围防御系统”。

从1994年到1997年,日本花费了大约5.6亿日元对导防系统进行基础研究,但日本政府内部对是否应参加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计划仍存在分歧。赞成的意见认为,由于朝鲜和中国等周边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日本目前尚无任何有效的防御手段,战

区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防卫性武器,对不拥有核遏制力量的日本来说是绝对需要的。另外,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爱国者”导弹发射装置和“宙斯盾”护卫舰等装备,建立“多层防御”体系。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认为,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在技术和资金上都存在不少问题。不仅如此,从政治和外交层面看,日本国会众议院曾在1969年通过关于和平利用宇宙空间的决议,而开发用于军事目的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则与该决议的精神相抵触;日本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还涉及到集体自卫权问题,而日本宪法是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此外,日本建立TMD将不可避免会刺激中国等等。

桥本政府比较重视反对意见,尽管美国一再施压,直到1997年日本仍未就正式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技术研究一事拍板定案。但防卫厅和外务省北美局主张日本应积极参加该计划,否则对日本安全不利,并可能导致日美关系的恶化。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核试验,8月31日,朝鲜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三级火箭,其残片溅落在日本附近海域。这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各界对日本参加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的支持率大幅攀升,甚至当初对导弹防御系统持慎重态度的最大在野党民主党领导人菅直人也主张要积极推进。[1]取代桥本内阁的小渊政府遂决定参加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并要建立日本自己的卫星监视系统。9月20日,在日美安保协商会议上,双方商定日本从1999年开始和美国一起对战区导弹防御进行“共同技术研究”。12月25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参加TMD的技术开发研究,并在1999财政年度预算中为此拨款9.6亿日元。1999年8月16日,日美就联合研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技术换文,并缔结了确定具体研究内容的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联合研究将从海基反弹道导弹系统着手,具体涉及导弹发动机、前锥体、弹头和红外传感器四个领域。2001年,日本又承担了有关雷达系统和武器控制系统方面的研究。

在对TMD进行基础研究和技术研究的同时,日本也在谋求发展自己的反导能力,向美方购买

24套改进型的PAC-2发射装置,并使之升级换代;购置了6艘“宙斯盾”驱逐舰,作为海军区域防御系统和海军战区范围防御系统的平台;装备了4架E-767预警与控制飞机和4星一体的侦察系统。此外,日本还在改进其现有的红外传感器以获得探测和跟踪弹道导弹的能力。

朝鲜核问题的再度凸现和布什政府决定在美国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加快了日本迈向开发与部署的步伐。2002年10月,美国披露了朝鲜的“秘密核计划”,引起日本朝野的极大关注,发展反导系统以对付朝鲜核威胁的呼声高涨起来。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在2004年年底之前部署一个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华盛顿也加大了对东京的游说力度,要其尽快决定加入美国在东亚的导弹防御计划。另一方面,在2003年春天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的“爱国者-3”型反导系统的表现比海湾战争中使用的“爱国者-2”型大有进步,这也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该系统可靠性的疑虑。这些促使日本最后下决心建立反导系统。6月21日,日本政府决定,将在2007年开始建立耗资2000亿日元的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包括两部分,一是部署在“宙斯盾”舰上的“标准-3”型导弹系统,用于高空拦截,二是陆基“爱国者-3”型导弹系统,用于中低空拦截。日本在发展导防系统问题上长达10年的犹豫和争论,终于尘埃落地。

二

日本发展导防系统有多方面的考虑。从军事角度看,日本部署导防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对付所谓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战略分析家们认为,在台湾海峡冲突升级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以导弹威胁或攻击驻日美军,甚或日本自身的目标;更担心的还是朝鲜导弹能力的发展。朝鲜目前拥有大约100枚“劳动1号”导弹,可以携带常规或非常规弹头,能够击中日本的大部分地区。日本担心在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朝鲜有可能以导弹威胁或攻击日本。日本把所谓中

国和朝鲜的导弹威胁作为发展导防系统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它强化其军事力量的一个借口，在逻辑上也是颠倒的。如果日本不把自己绑在美国的军车上，染指和干涉相关邻国的主权和内政，就不存在来自相关邻国的所谓威胁问题。

日本决定发展导防系统在军事安全层面的具体考虑是：第一，挫败敌对国家以导弹对日本进行政治讹诈的企图。日本的分析家称，如果在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朝鲜和中国都有可能以他们的导弹威慑来阻止日本向美军提供帮助。但是如果日本拥有有效的导弹防御能力，它就可以不顾这些国家的导弹威慑作出自己的决定。第二，导弹的精度越高，打击力就越强，其军事意义就越大。由于朝鲜导弹精度的提高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应积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以对付朝鲜的导弹威胁。第三，部署在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将能够保护驻日美军免遭弹道导弹的袭击，这将帮助美军开展灵活的军事行动。第四，由于日本处在朝鲜、中国和俄国的导弹射程之内，他们拥有的弹道导弹越多，意外或未经许可的发射的可能性就越大，日本只有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才能对付此种威胁。第五，如果日本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既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又有很强的拦截能力的话，它将抑制周边国家增加导弹数量的意愿，从而有助于减少弹道导弹威胁的扩散和增长。

维持日美安保体制的需要、日本防卫态势的调整和安全政策的变化也都促使日本作出建立导防系统的决定。日本对导防系统进行基础研究，是美国游说使然；从基础研究上升到技术研究，更是华盛顿不断施压的结果；最后决定开发和部署，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布什政府的影响。对日本外务省和防卫厅来说，之所以坚持主张日本加入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更多地是出于巩固日美同盟的考虑。不管导防系统技术上是否成熟，所需费用如何，日本要维持与美国的安保体制，就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跟着美国走。

日本防卫态势的变化对政府的决策有重要影响。随着对朝鲜导弹威胁担心的增长，日本的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主张要从“被动防御”转向“积极防御”，即从侧重于减少对方攻击造成的破

坏到着重发展防御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方和一些鹰派政治家甚至主张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据日本媒体透露，1993年朝鲜试射“劳动1号”导弹后，日本防卫厅曾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使用改进型空对舰导弹或利用战斗机投掷炸弹来袭击朝鲜导弹发射场的可能性。只是因为研究发现此举损失战斗机和飞行员的可能性很大，该研究小组才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2]但是2003年3月日本的2颗侦察卫星升空后，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又公开表示，为了对付朝鲜的导弹威胁，日本只是用间谍卫星进行监视还不够，还应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甚至采取先发制人战术，把即将发射的导弹在发射基地予以摧毁。虽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消除朝鲜导弹威胁的设想并未被日本政府所接受，但从“被动防御”转变为“积极防御”已成为日本统治集团的共识。

最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演变为日本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铺平了道路。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突破宪法限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成为指导日本安全政策的新理念。在这一思想驱动下，日本先是以维和名义实现了派兵海外的目标，继而又通过调整日美同盟修改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了《周边事态法案》，为日本在国门之外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9·11”事件后，日本又相继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3法案和“有事法制”3法案，几乎彻底摆脱了“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发展的限制。与此同时，日本的常规军事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以海上自卫队为例，它除了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宙斯盾”驱逐舰外，其“九·九舰队”（9艘驱逐舰、9架直升机）正向“十·九舰队”（10艘驱逐舰、9架直升机）转变，一旦完成这种转变，日本就将拥有4个准航母战斗群；它装备的3艘“大隅”级大型运输舰在必要时可改装为轻型航母，而即将装备的2艘“高波”级新型驱逐舰则被称为“直升机母舰型驱逐舰”。2002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将在2004财年国防经费预算中拨款建造1艘“直升机护卫舰”，以加强日本舰队的指挥和远距离作战能力。舆论指出，这个“护卫舰”其实是实

实实在在的“轻型航母”。现在日本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军费支出国，和世界上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之一。开发和部署导防系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是后冷战时代日本安全政策演变的必然结果。它所释放出的信息是，日本要成为军事大国，既要有锐利的“矛”，也要有坚固的“盾”。

三

日本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不仅将增强日本的“积极防御”能力，亦将提升日本的相关军事技术水平和攻击性军事能力。日本政府计划让日本企业同美国军工企业签订合作协定，从美国引进技术和零部件，由日本军工企业在国内生产“爱国者-3”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日本防卫厅认为，从美国获取生产技术在日本国内生产，尽管要比直接从美国进口成品的价格高许多，但引进技术自己生产可以培育日本防卫产业和提高军事装备技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3]从技术层面上看，反导弹系统技术与导弹技术是相通的，“TMD的燃料技术、推进技术、稳定技术、引导技术、预警技术甚至拦截技术都与攻击型导弹的技术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将TMD的软件进行调整并加上再入大气层技术，TMD就可改装成地对地的导弹。”[4]日本从美国获得的尖端的反弹道导弹技术也可以为研制弹道导弹所用，这就是日本决意要从美国进口技术而不是成品的原因之一。一旦将来日本决定发展核武器，其先进的导弹技术将大大提高日本的核打击力。这一可能性将使本地区的许多国家深感不安。

美国将日本拉入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将鼓励日本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安全政策。美国之所以要发展东北亚战区反导系统，主要是保护其在东北亚的驻军。日本建立导防系统，则是为了防备在卷入地区冲突时遭到导弹攻击。在现代战争中，日本狭窄的国土、稠密的人口和拥挤的交通网使其难以经受弹道导弹的攻击。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脆弱性有助于促使日本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保持低姿态，以免被卷入地区冲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在选择部署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之后，日本的安全感就会大大上升。在日本的军事力量不断加强、安全政策日趋活跃的大背景下，日本将更加积极地配合华盛顿的亚太战略，无论是朝鲜半岛问题还是台湾问题，日本在跟随美国介入时将更少顾忌，更加有恃无恐。这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

布什政府上台后，取消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区分，统称“导弹防御系统”。布什政府希望各地的导防系统最终能扩大并连接起来，与美国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一起组成一张“分层”防护网，保护美国本土、美国的海外驻军和盟国免受导弹袭击，实现所谓“全球化防御”。[5]日本建立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亦将成为美国整个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一旦导防系统正式部署，美日势必要建立联合指挥部，以统一指挥和控制该系统，从而大大推动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协调与一体化。此举无疑会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合作，提升日美军事同盟整体的攻防水平。如果说1997年修改发表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加强了日美同盟的攻击力的话，那么，日美联手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就大大增强了同盟的防卫能力。这样，日美同盟整体的攻防水平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有关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将不得不增强其防御和威慑手段，包括在质和量方面提高其导弹能力。这一发展将严重危及本地区的战略稳定，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日本部署导防系统，将使美国向台湾提供该系统的可能性增大。早在1997年11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就通过《美台反弹道导弹防御合作法案》，规定美国防部长应于1998年7月1日前向国会提出报告，说明美国应如何与台湾合作发展先进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保护台湾不受导弹的攻击。199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的《199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正式要求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尽管克林顿政府以导防系统仍在研发之中为由，对将来是否向台湾提供该系统暂不作出决定，但却积极向台湾出售建构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装备，包括“爱国者-3”型反导弹系统和远程预警雷达。另一方面，台湾近年来也不断鼓吹要加强美日台三方

在导弹防御上的合作,想方设法向美求购部署“海军战区范围防御系统”所必需的“宙斯盾”驱逐舰。虽然到目前为止,布什政府尚未答应台湾的这一要求,但却声称如有必要,将向台湾提供这一武器系统。2001年7月,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布什总统已经在早些时候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我们认为台湾的防御十分重要,台湾防御很可能成为导弹防御体系的一部分。”[6]随着日本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一事尘埃落定,台湾将更竭力要挤入该系统。据报道,布什政府已改变对台军售的顺序,将着重点放在对台出售“爱国者-3”型反导弹系统、远程预警雷达、“指挥、控制、通讯、情报”系统和PC-3反潜机上,这些武器系统既能提高台湾抵御大陆导弹打击的能力,又能为美国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充当耳目。美国最终将台湾纳入

东北亚战区导弹防御网的企图和努力将鼓励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使台独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使台海局势更趋紧张,将给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注 解:

*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1] 柴田哲雄,“关于日本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几点看法”,《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5期,第11页。

[2] 路透社东京2003年5月8日电:“日本曾研究袭击朝鲜”。

[3] 乐邵延:“日本计划自行生产爱国者反导弹系统”,《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6月24日,第5版。

[4] 蒋宇侃:“美国的TMD战略与东北亚安全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1期,第74页。

[5] 吴献斌:“TMD与台湾问题”,《当代亚太》2002年第4期,第42页。

[6] 德新社华盛顿2001年7月24日电,转引自吴献斌:“TMD与台湾问题”,《当代亚太》2002年第4期,第42页。

(上接第51页) 矛盾以至冲突。但是,宗教冲突,实质上决不仅仅是“神神战争”——即宗教内部的结构或派别之争及作为其沉淀的各种流派之间的争端。人类社会没有所谓纯粹的宗教战争,宗教战争的真正根源乃在于政治与经济,在于人类各种政治集团和社会力量围绕利益问题的争夺,如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控制与被控制之争等等。所以,“神神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神战争”,在更大的意义说是“人人战争”。在权利与利益的斗争中,宗教及其他文化因素作为一种历史积淀、一种信仰结晶会影响到争端的范围、方式及程度,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也可能演化为争端中的主要矛盾。但从根本上看它决不可能取代权利与利益的斗争而成为对国际冲突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角。可以说,所谓“文明的冲突”与“宗教的冲突”终究是表象,无论这种冲突多么激烈,它都不能揭示国际政治和国际冲突的本质。

宗教与宗教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却又极为细腻、敏感的问题。“宗教的历程反映了人之灵性经历,亦是其民族之魂形成、发展的生动写照。”而“宗教作为一种群体信仰现象,与人类各民族的发展密切相关。”[7]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宗教与民族问题被各种政治力量作为各自复兴社会精神、凝聚社会力量的文化认同纽带。宗教与民族、国家及

政治问题交织相伴,使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复杂化、尖锐化,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经常性的面临由此而来的麻烦和困境。因此,注重宗教因素与国际政治的关联,客观分析其间的互动规律,并由此制定国际互动中的文化策略,对扩展宗教的正面效应,抑制其负面效应和促进国际关系的健全发展是极其必要的。

注 释:

[1]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2] 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

[3] Martin E. Marty & R. Scott Appleby, *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1993) and *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s*(199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彼得·贝格尔:《神圣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第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5] 王作安:“当今国际宗教问题的主要特点”,《宗教》,2002年第1期。

[6] Fernand Braudel: *On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210—211.

[7] 卓新平著:《宗教理解》,第1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